

Alan Cole: Mothers and Sons in Chinese Buddh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寇爱伦著《中国佛教中的母与子》

沙洵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1998年,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寇爱伦(Alan Cole)的著作《中国佛教中的母与子》(Mothers and Sons in Chinese Buddhism)。寇爱伦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取得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刘易斯与克拉克学院(Lewis & Clark College), 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是寇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本书是寇爱伦关于中国佛教家庭价值的研究成果。共分10章: 第一章, “佛教的宣传”; 第二章, “儒教的各种情结”; 第三章, “萌芽中的佛教孝”; 第四章, “初期的母与子”; 第五章, “鬼节中的母与子”; 第六章, “佛教精英关于母与子的说法”; 第七章, “《父母恩重经》”; 第八章, “目连与母亲的十种恩”; 第九章, “佛教生物学”; 第十章, “两分的母亲和其他结论”。

第一章实际是全书的绪论, 作者介绍了自己的选题思路、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然后分析了佛教的特点, 指出佛教要求其信徒脱离生产劳动出家修行, 这样, 佛教徒就必须依靠世俗群众的供养才能维持生存, 于是他们制造了“功德”与“福田”的理论, 让人们相信今生的幸福得自于前世对佛教组织的布施, 要确保来生的幸福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布施。同时, 作者还指出, 在佛教传入之前, 中国并无供养公共宗教机构的传统, 所以佛教要想在中国生存下去, 必须营造这种传统。而要营造这样的传统, 佛教徒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母子关系。佛教徒深入挖掘了母子感情, 建构了一种新的家庭价值, 即佛教版的孝。这种孝向人们描述了一个起自于私人领域经过公共领域又回到私人领域包括三个步骤的循环式, 即: (1) 儿子感念母亲的恩情, 需要以某种方式报答; (2) 儿子被要求向佛教组织赞助; (3) 将母亲从地狱中解救出来及解决家庭中“恩情危机”的方法。简言之, 就是说, 一个人要想成为好儿子, 必须先做一个好佛教徒——就是供养佛寺以改善母亲的不幸宿命。这一价值为人们接受后, 佛教组织就从中国家庭那里获得了稳定的供养。

那么, 佛教徒为什么抓住母子关系作为突破口呢? 作者在第二章分析了儒教的经典, 认为儒教是探讨男人之间关系的学说, 在儒教中没有女人的地位, 儒教所勾画的理想世界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因此, 儒教的孝(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孝)是以父亲为中心的, 母亲虽然也是孝的对象, 但并非主要的对象, 儒教经典常常“父母”并举, 母亲是作为父亲的附属和陪衬而出现的。作者还引证了现代人类学者对中国台湾家庭的研究成果, 指出中国家庭存在一种特殊的紧张关系——婆媳关系。因为在父系家庭中, 母亲的地位要靠儿子得以巩固, 新娘的地位依赖丈夫来维持, 于是她们必为争夺同一个男人而发生矛盾。作者推测, 古代中国的家庭也应存在同样的紧张, 因为不贤的媳妇与背叛的儿子, 一直是中国叙事文学常见的主题。总之, 作者认为儒教孝的这些薄弱环节为佛教制造自己孝的理论提供了可能。

《书品》1999年第5辑发表了陈怀玉的《佛教版的“孝”——介绍 中国佛教中的母与子》一文, 本文关于作者背景的介绍参考了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资料。

于是，作者开始讨论中国佛教孝观念的演变。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考察了六种成书于 6 世纪前的关于家庭的佛教文献，以展现佛教传入早期的一些试验性的讨论。这些文献表明：在 5 世纪晚期和 6 世纪，盂兰盆会的信仰已经成功确立。这意味佛教的家庭意识形态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集中关注母子问题。作者认为，似乎在这一时期，佛教的作家开始确信，利用母子关系是影响中国家庭的最佳途径。第五章分析了关于盂兰盆节的三种伪经，以此来揭示“目连救母”母题的含义，指出佛教作家通过编造神话不断构建母亲、儿子和寺院的三角形经济结构。

接下来，作者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佛教的“生物学”，也就是关于“自我”(selfhood)的观念。作者认为，儒教把父系血统作为人们“自我”的来源，母亲仅是为“自我”的孕育提供了空间，而佛教却更倾向于把“自我”的来源指向母亲。第六章分析了三位 7 世纪的佛教精英——慧净、道世和善导的著作。指出他们关于“儿子感念母亲的恩”的讨论表明了一种给“自我”下一个全新于中国文化传统定义的趋势。第七章研究流行于 7 世纪的文献——《父母恩重经》和 9 世纪著名高僧宗密的复杂观点。作者认为，《父母恩重经》和宗密都把“自我”定义为以母亲为基础，他们虽然大力渲染母子感情，但却最终利用这一感情去支持父系模式，绕了一大圈的目的实际是为佛寺谋求供养。作者指出，在这一时期，佛教徒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巧妙地利用母子关系来加强家庭和寺院间的联系，在它们之间营造一种“共生”的关系。

第八章以两部敦煌文献——《目连缘起》和《目连冥间救母变文》为研究对象，强调它们专门解释了母亲的罪、她的恶行，渲染了母亲在地狱中的痛苦。第九章分析了产生于宋代的两种文献——《父母恩重难报经》和《血盆经》，认为它们对确立“儿子应感念母亲的恩”这一命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血盆经》，详细阐释了妇女因承担生育责任而要遭受的报应，将“原罪”强加于妇女。作者把这两种文献看作是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的佛教生育理论的顶峰。指出，这些理论非常成功地确立了寺院和家庭间的关系，并且使之作为一项佛教传统保留到了今天。

作者在最后一章中对全书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佛教的家庭价值中，母亲虽然被主要关注，但她并不是被敬仰的对象。佛教教义中母亲最明显的特点是需求性，她总是需要食物、舒适和拯救，而母亲所能获得的最好结果仅仅是免于痛苦。总之，佛教文献中母亲的形象是两分的，母亲的上半身是乳房和面容，代表慈爱，下半身则是产血，代表了不洁和罪恶。慈爱使儿子应当感念她的恩，罪恶让她需要儿子的拯救，而拯救的实现在于儿子成为一个好的佛教徒，即供养佛教组织。作者指出，这种教义对妇女来说是不好的，是男性利用宗教意识形态压迫妇女的例证。但作者同时认为，实际上妇女是欢迎这种教义的，因为在父系家庭中它毕竟可以为妇女提供额外的保护。

《中国佛教中的母与子》一书虽然篇幅不长，然而读后感到所受启发甚多。本书最重要的特点研究视角新颖。如书中所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术界对佛教的研究还偏重于烦琐的哲学方面，而作者把他的研究称作佛教家庭价值的历史，因此他大量使用以往不为人重视的伪经作为研究资料，并使用人类学的理论，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佛教的历史，探讨“罪”、“恩”、“报应”、“生育”这些在佛教中居于边缘地位但对于佛教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至关重要的问题。应该说，相对于仅仅从教理方面解释佛教典籍，这种重视宗教文献和宗教实践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研究思路，代表了宗教研究的新趋势。

正因为研究角度的新颖，使本书的一些结论也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关于佛教的孝，国内学者也多有注意，但往往用“佛教的中国化”加以概括。而寇氏没有把这一问题简单化，他对佛教的家庭价值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认为虽然佛教接受了儒教孝的观念，但对其进行了全新的加工，创造出了全新的佛教版“孝”，这种孝具有鲜明的佛教特色，也是维护佛教

利益的意识形态。的确，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是不是也在被佛教同化呢？寇氏的著作至少在某一方面给我们作了解答。人们常说，母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的地位，这难道不是佛教家庭价值传播的结果吗？

本书的另一独到之处，是关于“罪”在佛教中地位的论述。作者提到，西方的佛教研究有一种忽视“罪”在佛教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倾向，其实不仅是西方，中国同样如此，在我们看来“原罪”是基督教特有的观念，而佛教总是和“高僧”、“隐逸”、“禅机”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但作者却为我们揭开了久不为人注意的佛教的另一面，他认为“罪”在佛教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这些罪包括三种：（1）母亲和一般妇女的罪，这种“罪”源于性别与行为无关，所以是一种“原罪”；（2）儿子不孝的罪；（3）不供养佛教的罪。而且，佛教的道德标准扩大了罪的范围，一些日常行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原因，这使人们时刻处于可怕宿命的威胁中。作者进一步提出，佛教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充满宁静感的宗教，恰恰相反，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充满了对罪的焦虑感，没有了焦虑感，佛教也就不成其为佛教了。作者的这些讨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佛教家庭价值史”的范畴，对一般的佛教史和宗教学研究都有启发意义。

在第一章作者提到对他学术理论产生影响的思想家，其中包括马克思。我们确实能在本书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比如作者从经济的角度探讨意识形态的生成原因，认为佛教建构其家庭价值的目的是为了与世俗家庭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以获得稳定的供养。再如作者把佛教的家庭价值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研究其传播以及影响人们行为的方式，并在研究中揭示其维护父系家庭、压迫妇女的本质。不过，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引用任何一位思想家现成的理论观点，这些结论都是通过对材料丝丝入扣的分析得出的。应该说，如何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美国学者的寇爱伦，他的实践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当然，本书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使用传统上不受重视的伪经作为研究资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但是如果偏执于伪经，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除了儒家经典、伪经、变文和少量的佛经注疏外，作者几乎未使用任何其他中文文献，这就使的本书的立论显得不够扎实。比如，作者认为在佛教传入前，中国的家庭价值完全以父亲为核心，母亲处于附属和陪衬的地位，这就似乎不太符合实际，从正史中反映的情况来看汉代妇女的地位并非如此之低。史料选择的过于单一，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因此尽管作者表示要从更多的社会维度研究佛教的历史，但由于讨论仅局限于佛教本身关于家庭价值的说法，所以本书仍然没有脱离宗教思想史的窠臼，很难称为全面的宗教社会史著作。如果能结合其他史料，对佛教家庭价值存在和流行的时代、社会及相关人物进行了解与考察，揭示它存在和流行的意义，那么本书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

收稿日期：2006-12-21

作者简介：沙洵，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